

圣经文学和谐意蕴的表达及取向¹

高伟华

(沈阳化工大学外语系, 辽宁沈阳, 110142)

摘要: 研究圣经文学本身的文学魅力, 对圣经文学进行本源性的回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圣经文学的魅力首先在于圣经文学有着毕达哥拉斯式的和谐表达, 这种表达展现出圣经文学的静态的数学的和谐意蕴; 圣经文学的魅力还在于有着赫拉克利特式的和谐表达, 这种表达展现出圣经文学的动态的逻各斯的和谐意蕴。两种和谐意蕴相互交融, 表达了圣经文学的真正思想内涵, 并以此确定了圣经和谐思想的取向, 即整体性、规律性、均衡性、自洽性和开放性, 彰显出圣经文学和谐思想的文学定位与未来走向, 显示出圣经文学无尽的魅力与感染力。

关键词: 圣经文学; 和谐意蕴; 表达; 取向

中图分类号: B97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三大宗教之一, 基督教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据统计, 截止 2016 年, 基督教在世界各地有注册信徒 24.6 亿人口,² (虽然这一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 但也能说明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庞大的。) 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典籍, 圣经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 圣经一直是作为宗教神学典籍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的。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以实证性科学研究为特征的理性主义撼动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宇宙观, 对圣经的研究逐渐走出了神学阐释的樊篱, 圣经中所蕴含的文学价值日渐凸显, 出现了关注圣经自身的语言要素或其文学性质, 包括语法、文法、结构修辞等的“语法学派”和着眼于圣经和历史关系、揭示圣经历史人物真面目的“历史学派”。到了现当代, 圣经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世纪 50 年代, 犹太学者艾里克·巴赫出版的文学评论专著《模仿: 西方文学中的现实的表现》掀起了西方圣经文学研究高潮。之后, 大批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圣经的文学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较为著名的有罗伯特·艾尔特、梅厄·斯腾伯格等学者, 纷纷借用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圣经文学进行了多元解读和分析。

然而, 在圣经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 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当前对圣经文学的研究, 往往借用一种新的学科视角, 对圣经文学进行单角度、单向度的分析, 从而实现圣经的文学解读。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是, 如何抛开形形色色的学科视角, 从圣经文本本身剖析出所蕴含的审美内涵, 对圣经文本进行本源性的回归。我们知道, 圣经文本自发生以来, 就拥有了极其庞大的阅读群体, 并引导这一群体从恶向善, 劝导人们友善博爱, 一同构建和谐

¹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谐理念观照下的圣经文学研究”项目 (W2014066)

² 该数据引自百度百科: “基督教”词条。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ksxYdz2ejOJq5FZS8GJFVekD_V80u3BSiurOK5cSEPDifWezvw5HY23F5GRiKV8he-p4BLPGpAwR9Yk9XE8pfXNrlcHHwayms-JK8CspQDQh-vvBG2Qls_puUe5Ep

的社会。这其中除了圣经文本被宗教所赋予的神秘色彩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外，也与圣经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魅力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文本的神秘宗教色彩其实也是其文本魅力的另外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已。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学魅力是以何种形式发生而具有如此激荡心灵、引人向善的作用呢？下面将从圣经文学和谐意蕴表达的两个维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并以期取得文学取向上的定位。

一、圣经和谐意蕴毕达哥拉斯式的表达

梳理整部圣经文本，不难发现圣经不同于构思严谨的现代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它不是出于同一编纂者之手，而是由题材各异的数十部作品汇编而成，这些作品形成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体现了不同编纂者的多种见解和文笔风格。其实单就同一部经书，也有可能源于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多种原始资料，因而其中的观念、文体和笔法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以《以赛亚书》为例，该部分的前 39 章是分国时期的作品，大致形成于公元前 8 世纪，由先知以赛亚撰写；第 40 至 66 章则形成于波斯帝国称霸之后，认定是另一作者撰写，因为这一部分在内容、文风和神学思想和前一部分相比有了明显差异。作者、资料来源、成书时间和地点的复杂状态使圣经文本中常有前后重复，甚至是自相矛盾和彼此抵触的情况。比如在诺亚方舟的记载中，先说神要诺亚将飞鸟、牲畜和昆虫每种一对带进方舟，随后又要他将每种七对带进方舟（创 6:13；创 7:1），这仿佛是上帝言语不一，自相矛盾。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圣经中比比皆是，那么，这样看似混乱的一部文本，又何以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圣典呢？而且抛开其宗教方面神圣的面纱，其文字之中又有何种力量能够净化心灵呢？毋庸置疑，这样一部看似杂乱无章的文本背后一定荡漾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整部圣经貌似杂乱无章，然而从圣经的创作目的来看，圣经的最初创作者其实从一开始便对圣经的后续章节的创作做了有寓意的设计，圣经后续文本的创作是遵照这种设计展开的。圣经的创作者开章明义，以《创世记》为起始，一开始说道：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位圣日，……”（创 1—2：1）

圣经以混沌初开，神用七天造万物有着深刻的寓意的。这与中国老子《道德经》认为道生万物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圣经开篇即说世界“空虚混沌”（without form and void），这颇为类似于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提出世界始基于“无”的观点，“无，名天地之始”，老子认为天地初始，也是一片“空虚混沌”。先天地而生、运行于“空虚混沌”的“无”的世界里的神或者神的灵，则类似于老子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圣经的神与老子的道的区别就是圣经的神从描述上看更加具有人的外在特征，这一点在第六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得到印证，而道的形象则较为模糊，难以把握。神和道的相同之处则在于同产生于天地之先，同为万物之母，神用七日造出世界，而道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样就不难发现，圣经和老子其实是分别从零（或者称为“无”）开始，用了数字的形式（圣经用了顺次的七日，老子用了顺次的一、二、三等）在开篇构建了整个和谐完满的世界运行秩序。那么，以数为基础，建立起的秩序世界有何重要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的对数的系统研究入手。毕氏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而生“二元”，“二元”从属于“一元”，“一元”则是原因。从“一元”和“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的一切事物，乃至整个宇宙。因而宇宙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宇宙的运动是按照数的排列有序进行的。这也就解释了圣经文本所以从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却往往受到信徒无限崇拜，认为圣经不可动一字的原因，原来圣经文本在本质上是按照数字有序排列的，并非是杂乱无章的。这种数的有序排列在毕氏看来就是和谐的。那么可以说，圣经文本就是和谐的。从圣经文本阅读者的角度看，在阅读圣经文本时所感受到的字里行间的和谐精神就是一种改造思维、顺应自然的中庸精神，也是一种改变自己、对心灵净化的教育精神。同时在圣经中，数字虽然是如毕氏所说，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依次产生，但数字七、十七和七十在圣经中反复出现，是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的。上帝以七日造世界，第七日功德圆满，便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数字七从一开始便有着神圣圆满的含义。此外，圣经中还记载有一年一度的七七节。七七节(Shvuot)是三大节日之一，由逾越节第二天数七个星期，到第七个星期的次日就是了，以此庆祝暮春小麦的收获，象征着丰收圆满和新的起点。上文说道诺亚方舟，一开始，神要求诺亚带“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之后又要求诺亚带洁净的畜类和空中的飞鸟“七公七母”带进方舟，似乎显得神前后矛盾，语无伦次，其实不然。圣经以简洁客观的语言在隐含的叙述着神对世界的态度的心理变化。“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创6:5），就对自己的行为有些后悔，决意将世间生物从地上除灭，此时神应处于盛怒之下。但神仍旧钟爱诺亚，就命令诺亚造方舟，带一公一母的每种生物同住，并希望各种生物能够各从其类，繁衍生息。这里体现的是数字一，

数字一在圣经里是一种开端，是不圆满的。诺亚很听话，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表明此时神的怒气已然消了不少，并重新对世界燃起了希望。待到真要降灾的时候，神对世界上好的生物怜悯更多更大，于是便要求将洁净的畜类和飞鸟以七公七母的带进方舟，这里体现的是数字七，数字七寄托着神对世界和谐完美的期待。新约中记载有一次彼得就宽恕问耶稣，耶稣叫彼得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是完全饶恕的意思。（马太福音 18:21—35）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既然毕氏看来宇宙间的运动从数来讲是和谐的，因而宇宙之间的一切运动是有规律、有定数的，一切都服从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圣经诞生于数字，以数字开篇，神用七日从无到有构建了整个世界，这在上边已经叙述了，因而圣经从一开始便将貌似杂乱无章的各个章节置于有序的数的排列之下，以上帝或先知的预言代表着宇宙之间的定数与命运。神与亚伯兰立约之时，亚伯兰并没有子嗣，但神对亚伯兰说“你向天观看，算数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 15: 5）上帝或先知之所以如此肯定的做出这样的预言，按照数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洞悉宇宙的规律，宇宙是一个处于有序的数的秩序来控制的，也就是说宇宙是一种数的和谐，他们可以凭借这种数的和谐来了解未来的发展，这在读者来看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无疑会增加读者阅读圣经文本阅读的兴趣。这很类似于基于《道德经》和《易经》衍化出来的以五行八卦为推算方式的中国古代算命术。这种算命术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其能够曾经历千年而不衰，也和圣经一样，是与这种数字的魅力是分不开的，毕竟这表达了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一种原始的探索。

毕氏认为，这种数字和谐的美亦可见于音乐艺术方面。音乐产生于声音的有规律的运动，本质上说也就是数字的和谐；声音无规律的运动则是噪音。和谐的音乐可以把灵魂引向好的状态，可以净化有罪的灵魂，使之获得自由和解脱。在圣经中，诗歌是较为常见的文体，占全本圣经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了被称为诗歌书的《诗篇》、《约伯书》、《雅歌》和《耶利米哀歌》之外，大部分的先知预言也是采用诗歌的形式写成。诗歌是按照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用凝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古代，诗常常配以音乐和舞蹈，一起表演，诗常可歌，歌常伴乐，因而常有诗、歌、舞同源的说法。随着文化的发展，三种艺术逐渐分离，诗以语言为媒介，趋重意义；音乐以声音为媒介，趋重和谐。虽然诗与音乐逐渐分离，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相同的，诗的语言是以节奏为特征的和谐的语言，音乐的声音是以节奏为特征的和谐的声音。声音是语言表达的一个部分，语言是声音传达的一种方式，因而诗与音乐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诗与音乐均以和谐的方式通过节奏为手段感动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按照毕氏对音乐的研究，音乐撼人心灵的作用主要起源于音乐本质上由长短不同的音高和音低所代表的数的和谐的排列，并且这种数的排列是和谐的运动着的。其实作为音乐同源的诗歌也是如此。希伯来圣经中的诗歌大都采用贯顶体写成。由于希伯来语只有声母，没有韵母，因而这种诗体不压脚韵，而是运用头韵，全诗 22 节，按照希伯来文 22 个字母的顺序依次作为每一节诗的第一个字母。同时在诗歌内部以自由韵（free rhythm）

的节奏构成圣经独特的格律模式。这是一种和欧洲韵律诗体不同的变通运用重音节的格律节奏，不必从头到尾遵循单一的韵律格式，一行诗句可以有两三个或四个有重读音节的字词，平行句可以有或者没有相同数量的重读音节字词，构成诗体的平行句可以是二到四行不等，这一诗体颇类似于近代的自由体（free verse）。这种诗歌的表现手法在当时社会以及现代无疑都是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圣经诗歌的韵律在整体一致统一的前提下有着和谐的变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感动着人的心灵。

二、圣经和谐意蕴赫拉克利特式的表达

圣经中数的和谐表达的是一种静态的意蕴，是对世界本源的探讨，是对世界万物和谐秩序生成的一种理解。从本质上说，这种静态的美是东方的特质，这一点似乎和圣经诞生于东方是不无关系的。然而，就此来界定圣经的文学性是不全面的。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起源之一，自诞生之日起就逐渐从东方走向西方，最终在西方成为绝世之经典，圣经的身上必然要有着和西方文化的相似的基因。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从诗与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诗画讲究意境的美，诗中少有动词，画中常见恬静，这和圣经的东方本源是一致的，而西方的诗画，讲究的是动态的美，诗中最多动词，画中暗含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文学在保持着静态的和谐的美的同时，还应该有着动态的和谐的美，这种美应该是圣经中更加侧重的。那么圣经文学对和谐秩序的动态的美又是怎样阐释的呢？

圣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新约和旧约，因此又称为“新旧约全书”。圣经之所以被分为“旧约”和“新约”，是因为视本民族为上帝的选民的古犹太人把自己的“圣经”当作上帝与人所立的“契约”，但这种契约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守约和违约中建立起来的。在伊甸园中，上帝与亚当夏娃立约，达成永远不食禁果而永享太平的约，但不久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违了当初的约，从而被逐出伊甸园到人间受苦受难，亚当夏娃的子孙经历生死轮回之苦，在辛劳一生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又降洪水之灾毁灭世间一切，唯有诺亚感蒙上帝的恩惠，上帝见他是个义人，便与诺亚重新立约，确保人世间不再有洪荒之灾。等等以此往复，直至上帝与耶稣重新立约，形成了圣经独有的“立约→违约→受罚→悔改→重新立约→守约→违约”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表象上看似乎周而复始，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循环，实质上却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

圣经中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意味着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对立与斗争。在立约与违约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抗争与冲突，而是有着辩证法意义上的内涵。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对类似的这种对立与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赫氏的思考和研究是建立在他的以逻各斯基础的对立和谐观的理解之上的。赫氏的这种对立和谐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制。这种对立的过程主要体现地、水、风、火四大要素交替更迭上。自然事物都是处在由地到水到风到火（上升）和由火到风到水到地（下降）的

不断转变过程。这种过程颇为类似于中国的五行相生相克，即在由此物到彼物的过程中，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并转化，因而可以说是对立的事物而不是相同的事物中促成了发展。如上文所述，圣经中独有的“立约→违约→受罚→悔改→重新立约→守约→违约”的发展模式就是这样一种转变过程的表现形式。神与人不断立约，不断违约，立约和违约之间有着依存的对立与转化，就在这对立与转化中实现着人类前行发展的和谐之美。

圣经中的发展模式还意味着在对立与斗争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程度的逻各斯，使着对立和冲突遵照着某种规律的作用而前进。赫氏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和斗争中运动的，并且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对立和斗争的运动使世界充满生气，而逻各斯本身是并不引人注目的。因而可见在赫氏的所谓的对立和斗争是暗含着和谐的。圣经中的独特的周而复始的发展模式与赫氏的逻各斯的和谐观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如前文所说，圣经以数开篇，宇宙之内“空虚混沌”，而生出神的灵，即是所谓的“无”生“有”，随之神的灵用七日造世界，这就是一种数的对立发展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数的隐形规律下，圣经中的各个事件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两元对立的关系：立约与违约，饥荒与富足，逃亡与回归，不育对生育，奖赏对惩罚，生存对死亡等。而面对这样的对立因素，圣经中的主人公没有消极的退却与沉沦，而是奋发向前，最终向着健康、完善的道路发展。例如，在圣经的历史叙事部分，摩西受命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是较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篇章。故事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埃及时期，作为奴隶的希伯来人发展迅速，国王认为这构成了威胁，于是采取限制以色列人口的措施，命令产婆将刚诞生的犹太男婴杀死。摩西在这种情况下幸运的生存下来。并且被公主收养成为埃及王子。但摩西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带领深受苦难的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然而在逃亡中，摩西除了面对外部的危险之外，来自希伯来人内部的不满也让摩西大费脑筋。但最终，摩西战胜了困难，铸就了希伯来民族中的英雄地位。在这则故事中，对立因素此起彼伏，但无论怎样，摩西依旧奋发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读者。

在圣经的冲突与对立中，如赫氏所说，有一种是引向产生的，就是所谓战争与冲突，冲突与对抗是绝对的，是促进发展的动力。上面这些对立与斗争和上帝与人类的不断订立的契约非常相似，都体现着逻各斯的和谐，这种和谐以不断地对立和斗争来展现发展的规律，给人以希望，让人们坚定相信通过奋斗必将走向灿烂的未来。这形成了圣经中有特色的动态的美。

三、圣经文学和谐意蕴的取向

圣经文学展现的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和谐，从本质上说，将圣经文本的内涵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这种和谐精神的交融与汇合使圣经文本的思想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升华。圣经文本在这样的和谐理念的定位下显示出无尽的魅力与感染力。

1、圣经文学和谐的整体性。

圣经文学从表象上看，内容、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仿佛是一部汇聚千年文化积淀的大百科全书，内容、题材和人物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人物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于一定的题材和内容之中，亚当夏娃存在于神话题材之中，亚伯拉罕和约瑟存在于传奇题材之中，摩西大卫存在于历史题材之中，路得约伯存在于小说哲理题材之中，诗篇与雅歌存在于诗歌题材之中。各个内容、题材和人物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统一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种下孽缘，埋下了后来人类的重重罪孽。亚伯拉罕和约瑟的种种不幸与奋斗也都是为了伊甸园的过失而赎罪，国破家亡之时耶利米做哀歌，踌躇满志之时大卫做雅歌。将圣经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单独拿出来都是不完整的，同理，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圣经也是不完整的，圣经的这些部分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着前因后果、体系完善的整体。从隐象上看圣经却是一部融合了静态的和谐的美和动态的和谐的美的集合，表象与隐象互为交融，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圣经文本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会损害这种有着密切联系的整体美。圣经中，整体性的合力是单个部分所无法比拟的。

2、圣经文学和谐的规律性

和谐的规律性表现为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达成了各归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行其道的良好状态。宇宙万物都有各自运行的秩序和规律，符合秩序和规律的方式运行，则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违反秩序和规律的方式运行，则走向毁灭与失败。圣经文学开宗明义，前五章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被称为律法书，被尊为信仰的基石和上帝为世人制定的根本行为规范。圣经开篇即说混沌初开，世界无天无地，一片浑浑噩噩，上帝之灵用了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有序的世界，要求世间万物各从其类，各司其职。从此有了生机盎然的锦绣人间。伊甸园内，亚当夏娃作为人间的首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意旨，即自然的规律。偷食禁果的行为，就属于违背了上帝的意旨，也就是违反了自然地规律，结果是被逐出伊甸园，开启了人类的罪恶之门。圣经文学中，规律性是人类和谐精神的展现，是人类走向和谐的精神保障。

3、圣经文学和谐的均衡性

和谐的均衡性表现为系统要素间质能交换的对称平衡。在自然之间，自然与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质量或者能量的交换。如果这种交换是对等的，系统则表现为对称平衡的和谐状态，事物就会存续下去，发展下去。相反，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有失公平的，系统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严重失衡，事物就不能保持它自己，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圣经以其特有的对立与发展关系，展现出和谐的均衡性。在《出埃及记》中，说到处治伤害别人者的律例，“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种规则所体现的就是和谐的均衡性。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均衡关系，才保证了之后的长期稳定与团结。在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时，亚伯拉罕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和犹豫，相反，伸手拿刀就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这一行为，表现了对上

帝的无限忠贞，得到了上帝的赞赏，于是上帝便赐福于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星，地上万国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从隐喻上来讲，上帝代表的是自然与法律的庄严，亚伯拉罕用自己与自然规律的遵守和法律的服从换来了持久的和谐稳定。很明显这就是一种对称的交换关系。相反，若是亚伯拉罕在自然规律和法律面前屈从了亲情，违反了规律，触犯了法律，那么他将绝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导致种族的灭亡。

4、圣经文学和谐的自洽性

和谐的自洽性表现为系统与要素之间及要素与要素之间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的性质。这种性质的和谐关系就是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具备这种机制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反之则是不和谐的。圣经中各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依赖和转化，就是这种和谐的自洽性。上帝开天辟地之后，造出了世间万物，虽然万事万物各从其类，但这些生物是无序的，于是上帝在第六日造出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此时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人依靠自然而生存，自然在人的治理下有序发展，人与自然有着彼此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一切是和谐的。但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反了人神的约定，隐义上也就是违反了人与自然的规矩，人类被逐出伊甸园，自洽性被破坏，直到与人类重新立约，才恢复了这种自洽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还有摩西与族人之间，扫罗与大卫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促进制约的关系，调节适度，则关系平和的发展，关系僵持，则出现战争的爆发。

5、圣经文学和谐的开放性

洋溢着和谐理念的圣经文学展现着无限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可以理解为内涵的无限扩展性。圣经文学以上帝七日创世纪开篇，隐喻宇宙万物的数的和谐规律，这种数的和谐内涵包容世间万物，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无限扩展性从而奠定了圣经整体基调的无限扩展性。这样就不难理解圣经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原由了。正是这种开放性促成了圣经文学无论在文体风格还是内容构建上都为西方文化的未来做出了榜样的作用。这种开放性其次可以理解为发展的无限性。圣经文学不断以逻各斯和谐的方式引导着冲突和对立的前行，在上帝与人类的不断地立约与违约中逶迤发展，表达了一种未来世界的无限发展可能，这本身就是对未来世界的探索，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开放性籍着和谐的规律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诚如以上所述，和谐思想是圣经文学中一种重要的美学思想观念体系，在整个圣经文化大系统中处于核心的位置，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圣经文学的单向度的解读，这种和谐思想一直隐性的存在于圣经文本思维之内，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圣经阅读群体，其思想尚未得到正式的认可和提出。因此，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于纷繁复杂的圣经文学中提炼出圣经的和谐意蕴，将圣经文学中荡漾的和谐思想以静态的数的分析和动态的逻各斯的演绎呈现出来，并以此确定了圣经和谐思想的五大取向，彰显出圣经文学和谐思想的文学定位与未来走向。可以说，这是将传统圣经文学中所忽视的和谐思想凸显出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就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圣经文本如此杂乱又何以具有巨大魅力的原因。正是因为圣经文学的和谐意蕴,才使着圣经文学在西方独树一帜,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正是因为圣经文本的和谐意蕴,才使着众多的文本读者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使着走向善的和和平的方向。那么,可以断言,作为这么一部惊世之作,圣经文学的魅力必将籍着和谐的意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随着和谐意蕴的深入挖掘,圣经文学的魅力也必将大放异彩,以一种暂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 [1] W.克莱恩等著,尹妙珍译:《基督教释经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6页。
- [3] 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年,第449页。
- [4] 梁工:《圣经指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5] 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4页。
- [6]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 [7] 清凉道人:《悟解道德经·金刚经·易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页。
- [8] 易超:《和谐哲学原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 [9] 朱光潜:《诗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 [10]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 [11] 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The Express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Harmony Implication of Biblical Literature

Gao Weihu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110142)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literary charm of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itself and to make the return of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The charm of Biblical literature lies first with its Pythagorean Harmony expression, which shows its static Harmony impli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figures. The charm of Biblical literature also lies in the Heraclitus Harmony expression, which shows the dynamic Harmony impli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gos. The two Harmony implications blend together and express the true meaning of Biblical literature. Based on thi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Harmony Thought, namely, integrity, regularity, balance, self-consistency and openness, is determined, which shows the literary posi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Biblical literature Harmony Thought and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endless charm and appeal.

Keywords: Biblical literature; Harmony implication; expression; orientation